

赵贞吉与泰州学派的学问传承

刘琳娜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新加坡 637332)

摘要:明儒赵贞吉是否应归属于泰州学派的问题近年引发了学界的争议,虽有学者提出了否定“徐樾—赵贞吉”师承关系的证据,但由于文献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尚不能由此轻易否定赵贞吉泰州学人的身份。赵贞吉与泰州学人有频密交流,并有思想上的传承,进一步说,他对泰州学派的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思想角度而言,赵贞吉与泰州学派之间的学问渊源有据可依。

关键词:赵贞吉;泰州学派;归属;徐樾;黄宗羲

DOI:10.13603/j.cnki.51-1621/z.2018.01.015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785(2018)01-0081-04

赵贞吉(1507—1576),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明嘉靖、隆庆年间儒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以博学多闻与风骨刚直而称名于世。明史称其“六岁日诵书一卷,及长,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学”^{[1]5122},李贽(号卓吾,1527—1602)对其思想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吾谓赵老真圣人也”、“夫赵老何人也,巍巍泰山,学贯千古”^{[2]10},俨然将其视为得心学之骨髓的一代真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他归入泰州学派,并从李贽之言,认为其师承王艮(号心斋,1483—1541)的弟子徐樾(?—1552,号波石)^{[3]746-759}。但这一论断近年受到了学界的质疑。最早是荒木见悟先生在《赵贞吉的思想》一文中指出,赵贞吉致徐樾的书信中,称谓语气更像对待同辈友人^{[4]57},而吴震先生在《泰州学案刍议》一文中亦主张徐与赵是同辈关系而非师生关系^[5]。从现存的书文资料来看,这种质疑确实有其合理性。但是否可以由徐赵师承关系的争议直接否定赵贞吉泰州学人的身份,又是否应该在泰州学派的研究中“将赵贞吉弃之不顾”^[6],则仍有商榷的余地。本文拟从史料的复杂性、赵贞吉与泰州学人的交流以及思想上的传承性,以及赵贞吉对泰州学风的影响等三个方面重新检讨这一问题,以期还原其在思想史上的恰当

位置。

一、论及师承关系的多种史料

关于质疑“徐樾—赵贞吉”的师承关系的文献,荒木见悟先生主要援引了赵氏《与徐波石督学书》中“别久无缘奉书问,身无羽翮,思君实劳,君所念我,应亦尔也”^{[6]542}一句,其中表示思念和关切的语气不似师徒,又有《梦波石徐子》一诗,大洲以“子”称呼波石,均似以平辈相待。此外另有胡直(号庐山,字正甫,1517—1585)在给赵贞吉写的传记中,言及“公退与同志友尹公台、徐公樾、敖公铎等切劘,不与世比”^{[7]776-784},称徐樾为赵的“同志友”,可见二者应为平辈。从徐、赵二人的通信语气,以及胡直等人的言论记载中可以推测,赵贞吉至少并未刻意执贽拜入徐樾门下。

但另一方面,肯定“王艮—徐樾—赵贞吉”之传承的论述也并非无稽之谈。在不少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学者对此传承关系的反复确认和转述^[8]。如颜钧(号山农,1504—1596)在其自传中记述在京师与赵贞吉同游徐樾门下:“游入帝里,忽遇一师,徐卿波石,讳樾,字子直,贵溪人,时为礼部侍郎,当有庶吉士赵贞吉,号大洲,内江人,敖铎,号梦坡,高安人,先列游夏座,引农同门,师事三年,省发活

机”^{[9]25},颜钧师事徐樾,又引赵贞吉、敖铤为同门,可以看出赵是当时京中以徐樾为核心的论学圈子中的一员。

李贽和耿定向(号天台,1524—1596)对于泰州学脉传承关系的描述更值得注意:李贽十分推崇泰州的“英雄”风范,他提到“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贞吉,大洲之后为邓豁渠”^{[2]74},由此提出了“王艮—徐樾—赵贞吉—邓豁渠”这一系谱。耿定向的认知与李贽略有不同,他指出“徐方伯子直承之(王艮),传赵文肃;罗大参惟德承之,传宫洗杨贞复”^{[10]546},基本上将泰州的传承分为两条线索,一是“王艮—徐樾—赵贞吉”,二是“王艮—罗汝芳—杨起元”。虽然表述略有差异,但二者对于“王艮—徐樾—赵贞吉”的脉络都是持确定态度的。耿、李均为赵贞吉同时代人,且有学问上的交流和联系^①,他们的论述应是较具可信度,值得慎重对待的。

除此以外,几位时代稍晚的学者在论述王学的传承时,都将赵贞吉归入王艮所传承的泰州一脉系谱下,如袁宏道认为“夫阳明之学,一传而为心斋,再传而为波石,三传而为文肃,谓之淮南派”^{[11]1535},顾炎武亦言:“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贞吉,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簒”^②,王铤在其所编的《宗谱纂要》一书中,亦将赵贞吉置于“泰州之学”条目下^[12]。这些论述虽然在细节上不同,但将赵贞吉归属于泰州学派的立场却相同,实难以“以讹传讹”为由将其一并推翻。而荒木见悟先生也曾指出,王心斋门下有忘记年辈前后,彼此交流的风尚,学人之间以“子”相称是当时的时代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徐樾与赵贞吉之间以友人相称的现象,为“徐—赵”的学问传承留下了余地。因此虽然徐、赵的师徒关系确有存疑之处,但由于史料的复杂性,在找到更坚实的证据之前,尚不能轻易否定赵贞吉与泰州学派间的传承关系。

二、赵贞吉与泰州学人的思想传承

师门传承固然是考虑学派谱系的重要标准,但对于阳明后学这一复杂的群体而言,思想上的交流和学术主张上的契合也应当是考虑的指标。

赵贞吉与泰州学人之间的交游颇为频繁。他在京师与徐樾、敖铤等人的来往是其为学经历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份。如在给赵浚谷的书信中,表白自己不会因为沉溺禅佛而丧失有为之志、辜负经世之才

时,提及“顷京师有友人亦以此意相责”^{[6]574};在给谢给谏的论学文字中,说到自己学问回归一旨的关键:“某濡迹宦途,而学稍归一,则以京师豪杰所聚,而海我无涯矣”^{[6]447},行文之中颇能见到对学友间相互砥砺的感念,并将自我思想的成形归功于宦游京师期间与友人的交流切磋。此间“京师诸友”虽难以细考,但无疑应包括徐樾。此外他与颜钧也有过密切往来,《明儒学案》载“山农游侠,好急人之难。赵贞吉赴贬所,山农偕之行,大洲感之次骨”^{[3]746-759},赵、颜二人思想上的交流虽不见记述,但颜钧之豪侠气概亦颇让大洲心有戚戚焉。

即便赵贞吉未执贽入徐樾门下,二人在某些学术观点上的一致性也是无可否认的。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特别讨论了二者论“中”的相似性:

按先生(大洲)之论中也,曰“世儒解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而不知言中为何物。今夫置器于地,平正端审,然后曰‘此器不偏不倚’;度物之数,长短适中,然后曰‘此物无过不及’。今舍其器物,未问其作何名状,而但称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茫茫虚号,何所指归?……宁有三圣心传,不指其体而仅言其效乎?”波石之论中也,亦曰:“伊川有堂之中为中,国之中为中,若中可拟而明也,《易》不当曰神无方而易无体矣。”故知先生有所授受也。^{[3]746-759}

当时学者在解《中庸》时可能侧重于关注“中”的形而上学特征,专注“惟精惟危”的面向,而甚少在任何具体器物的层面言之,追问“所言何物”。而赵、徐二人则一致认为“中”当由具体的事事物物展开,而不是仅以一抽象的总纲来理解“中”。赵贞吉认为如果“舍其器物”而只言“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不知其具体的指归,毕竟对应一物事之“中”不能通于其他物事,不可离其体而仅言其效,落入茫茫虚指之中。而徐樾也提到“伊川有堂之中为中,国之中为中,若中可拟而明也”,借用程颐谈“中”时强调的“堂之中”“国之中”等具体的方位指涉,强调不应离开事物而谈中。故而徐、赵的观点具有其独到性,他们在此观点上的一致性,正是黄宗羲判断赵贞吉“学有授受”的依据之一。

赵贞吉对阳明、心斋均怀有追慕之心。他对良知学表示过明确的认同,如有“天命之性者,生质之本然也,良知也”^{[6]436}等语,以良知明道体,符合阳明心学的论述思路。在其所撰的《泰州王心斋先生墓志铭》中他自述云:“先生门人贵溪徐子直氏、道州周

季翰氏,谓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义当志其墓中之石”,句中透露出对王艮的仰慕,而王艮对他也是青眼有加,这种互动关系必然建立在二者思想的认同之上。赵贞吉深赞心斋:

先生之学以悟性为宗,以格物为要,以孝弟为实,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启后学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可谓契圣归真,生知之亚者也。^{[6]505}

这里以“契圣归真”称赞王艮的学问,评价不可谓不高,而大洲能以了了数语对心斋之学进行精确的概括,精辟地拈出“以格物为要”概括其学,可见对泰州学说有所钻研。实际上,赵贞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王艮“大人者,此正己而物正者也”“立吾身以为天下国家之本”^{[13]3}的“格物”思想,注重“本末”之辨,以修身明德为本,而以平天下为末。他在《经筵讲章》中对君主阐发道“以修身天下国家之本,而诚意又是修身第一紧要的工夫”^{[6]371},他认为“平天下在絜矩,而絜矩非明德不能”,因此君子“治他务皆所未遑”,在提升自身的德性修养之前,不应该过分注重于外物,而应先审察己身意念之发,做存善去恶的修养工夫来实现明德,“如是则心正身修全体之昭明自复,而大用之絜矩自行,欲平天下不难矣”^{[6]372},由修身以达到平天下虽然是《大学》文本本身的逻辑,但是赵氏的论述中对修身为本以及对絜矩这一概念的强调,不难看出与心斋思想的契合之处。

三、赵贞吉对泰州学风的影响

赵贞吉与泰州学人交游频繁,又在思想上与心斋、波石等人有契合之处,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将其归入泰州门下的理由。而黄宗羲在《泰州学案二》中少见地仅录赵贞吉一人,除了他在思想有特殊性外,或许也是肯定其在传承泰州学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李贽在讨论王门后学传承时,认为赵贞吉是真正接续心斋的核心人物,其历史地位超过了徐樾。他将赵与罗汝芳并提,认为他们是心斋门人中最可圈点的两个“好儿孙”,甚至是由于他们的成就,而使王心斋乃至泰州学派得以荣显:

心斋先生之后,虽得波石,然实赖赵老(赵贞吉)笃信佛乘,超然不以见闻自累。……故余尝谓赵老、罗老(罗汝芳)是好儿孙以封赠,荣显其父祖者也。^{[14]85}

李贽将赵贞吉视为泰州一脉中的发扬光大者,王艮之后,得泰州真髓者是赵、罗二人。这与近代学界研究泰州学派普遍聚焦于“王艮—颜钧—罗汝芳、何心

隐”一系,而对赵贞吉鲜有关注的现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赵贞吉思想研究仍是目前泰州王门研究中一个缺失的环节,缺少这一环节,泰州思想的脉络难以得到全面的呈现。李贽认为赵贞吉笃信佛教,精研佛法,直至修行有得,有荣显王心斋乃至泰州学派之功。这一观点与李贽本身推崇佛教有关,难免有所夸大,但泰州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涉入佛教,却不容置疑。将修习佛法当作契入圣道的一个重要途径,突出了泰州学脉突破传统儒学框架的一面。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界定泰州学案的宗旨时也指出了“融摄佛老”的影响,如其所言:“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3]746-759}黄宗羲出于维护儒门正宗的立场,批判王艮、王畿“跻阳明而为禅”,特别指出造成泰州一派脱离名教束缚,乃至“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原因,是对禅学的不加节制地吸纳所造成。但事实上,当我们检视泰州学派的思想展开,会发现其开创者王艮的学说中涉入禅学的成份并不多,其关怀核心仍在于“格物”“絜矩”等儒家命题。然而何以泰州学演变成为一波“风行天下”的引释入儒的思想潮流,除了与良知学与佛学本身的共通性格为二者的接近提供了基础以外,其中影响力的人物如赵贞吉等对佛学的关注和阐发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若我们接受黄氏设立泰州学案的立场,将好禅作为泰州一脉的主要思想特征,那么赵贞吉的身上无疑是非常具备这种“泰州学的特质”的。

赵贞吉不仅深研性命之学,并且对自己的入禅直言不讳,在与友人赵浚谷的书信中,大洲直言“夫仆之为禅,自弱冠以来矣,敢欺人哉!”^{[6]574},明儒姜宝在给赵的文集写序时极力赞叹他的坦荡直接:“今世论学者,多阴采二氏之微妙,而阳讳其名。公于此能言之,敢言之,又讼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盖其所见真,所论当,人固莫得而訾议也。于乎,若公其可谓豪杰而圣贤矣。”^{[6]245}诚如所言,宋明儒学与佛道之间复杂的交涉关系已是有目共睹,然作为正统儒者,出于立场需要而讳言甚至排斥佛道的现象实为多见,而赵贞吉一反风习,畅言自己出入儒释,并以自身的立身行事为禅学辩护:“试观仆之行事立身,于名教有悖谬者乎?则禅之不足以害人明矣。仆盖以身试之,非世儒徒以口说诤论比也”,如此真诚爽快的态度与泰州学派的“豪侠之风”“狂者胸次”

甚为契合,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袁宏道称“近代性命之学,始于赵文肃,尝窃读尚书,出入禅儒,而去其肤,关、闽所未及也”^{[11]1534},非常推崇赵贞吉思想的高度,将其视为晚明性命之学的引领者。

正是在这种推崇佛教的直率态度的影响之下,赵贞吉之后的泰州王门中,直接语佛演化成为一时风气。最显著的比如李贽,是受徐用检(号鲁源,1528—1611)拈提《金刚经》论学影响而始学佛理,而徐用检正是追随赵贞吉讲学者。此外如焦竑(号澹园,1540—1620)、管志道(号东溟,1536—1608)、杨起元(号复所,1547—1599)、周汝登(号海门,1547—1629)、陶望龄(号石簑,1562—1609)等,都有深入佛禅,谈玄说妙之经验,毫不避讳对佛学的喜好。钱谦益(号牧斋,1582—1664)认为“今之谈禅者,皆宗赵大洲‘只贵眼明,不贵践履之说’”^{[15]1800},可见其直任好禅对当时的学风颇有影响。

综上所述,黄宗羲在设定泰州学派时,并不严格以地域为划分依据,亦不仅仅遵守师门传承的线索,而是将人物的思想和人格特征作为重要的判别指针。这种做法虽引发了不少争议^③,但亦有其合理性。对于泰州学派这样一个人物复杂、思想个性鲜明的群体而言,难于以师承等某一确定的标准衡量。正如李贽所言:

如其迹,则渠老(邓豁渠)之不同于大老(赵大洲),亦犹大老之不同于心老(王心斋),心老之不同于阳明老也。若其人,则安有数老之别哉!知数老之不容分别,此数老之学历以能继千圣之绝,而同归于“一以贯之”之旨也。^{[2]5}

从形迹而言,王阳明、王心斋、赵贞吉的经历、个性各不相同,思想主张也各有侧重点,而李贽之所以认定他们一脉相承,是因为他们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主张。从李贽答邓石阳的话中来看,他所认为的“一贯之旨”是与朱子学有所区别的“精一之传”,也是心学一脉的自我定位。若我们接受李贽的判断,赵贞吉与泰州学派之间的思想渊源应是有据可依的。

注释:

- ① 胡直是赵贞吉与耿定向的共同好友,耿定向熟悉胡、赵的书信往来,在其文中多次提及赵的思想,如有“细玩兄与大洲书中语,此等解说似亦不须言者”之语,见《与胡庐山书》第六,《耿定向集》,页88。李贽与赵贞吉应也有所交

流,嘉靖四十五年,李贽在北京任礼部司务,时徐鲁源从赵大洲讲学,贽不肯赴会,徐出《金刚经》示之,贽始向学,很可能就学习于赵大洲门下。参黄宗羲《太常徐鲁源先生用检》《明儒学案》卷十四。

- ②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M]. 长沙:岳麓书社,1996: 666。但氏关于“颜钧一赵大洲”传承的说法并不可靠,依前述颜钧之言可辨。
- ③ 除赵大洲以外,耿定向、周汝登等人的学派归属问题也曾引发学界争论。如吴震先生《泰州学派研究》一书试图对泰州学案进行重新厘定。然而对泰州学派的争议点主要在于是否一定要将泰州学派限定为王艮门徒的群体,或者是泰州一地的学术社群?如若如此,泰州学派只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远不能产生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力。或许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折衷的认识,在充分认识到泰州学者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的同时,依然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学术渊源和联系,从而将其视为一个广义的“学脉”或学术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李贽. 焚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 黄宗羲. 明儒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4] 荒木见悟. 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M]. 廖肇亨,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5] 吴震. 泰州学案刍议[J]. 浙江社会科学,2004(2):142-150.
- [6] 赵贞吉. 赵文肃公文集:二十三卷[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一零零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
- [7] 胡直. 衡庐续稿[G]//四库全书:第一二八七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8] 黄卓越. 明儒赵贞吉的经世出世论:学渊与间架:兼论一种思想史的线索[J]. 明清论丛,2010(10):259-274.
- [9] 颜钧. 颜钧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10] 耿定向. 耿定向集[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11] 袁宏道. 袁宏道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2] 王铤. 宗谱纂要[M]. 清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本. 道光七年沈懋德世楷堂刊,光绪二年重印本.
- [13] 王艮. 王心斋先生语录[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5.
- [14] 李贽. 李贽全集注[M]. 张建业,张岚,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15]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王建平)